

# 賦權交換與區域間的 協調發展

張曉波

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其最重大的代價之一就是199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嚴重加劇。目前從各個角度來觀察中國的經濟不平等，包括社區內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都在迅速擴大，其嚴重性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sup>①</sup>。如何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公平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是通過財政放權，給予地方更大的積極性來發展經濟。但是政府的管理體制上甚少變化，地方政府的規模主要與人口掛鉤，與經濟發展關係不大，它們的重要職能依然是要執行一系列從上面布置下來的中心任務，比如計劃生育、安全生產等<sup>②</sup>。由於各地的經濟規模和基礎相差很大，目前的制度安排無論在東部發達地區還是在西部欠發達地區，都導致了公共服務的嚴重不足。在西部地區，有限的財政收入不足以支持相對龐大的地方政府規模，在公務員工資以外，公共服務經費常常捉襟見肘。公共服務不足大大減少了發展現代農業和非農產業的機會，從而降低了農民離鄉背井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在東部發達地區，大批勞工湧入，實際居住人口超過戶口登記的本地常住人口。由於政府的規模主要是由正式的戶口人數決定，實際常住人口的膨脹也導致公共服務不足，大大提高了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兩類地區公共服務均不足，不僅擴大了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更導致中國農民日益流民化的危險。本文的目的就是從制度安排與變遷的角度，說明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與最近十餘年來不平等迅速擴大之間的關係，並提出用社會賦權交換的手段來減少地區差距、促進和諧發展的建議，而社會賦權交換離不開國家權力的干預。

由於各地的經濟規模和基礎相差很大，導致公共服務的嚴重不足。本文的目的是從制度安排與變遷的角度，說明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與最近十餘年來不平等迅速擴大之間的關係，並提出用社會賦權交換的手段來減少地區差距、促進和諧發展的建議，而社會賦權交換離不開國家權力的干預。

## 一 等級產權和等級身份——中國制度安排的重要特徵

中國建國以來形成的治理結構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sup>③</sup>。上級政府有甚麼單位，下級政府一般就有相對應的機構。這種制度安排有如下特徵：

1、處在金字塔結構中等級地位愈高的單位，在獲取公共資源和佔用公共資產上擁有更大的特權，其成員也享有更大的經濟保障。但是，等級較高的單位支配資源的自主權受到更大的限制，其成員的個人收入和福利與佔用資源的產出效率之間的聯繫也更弱。處在金字塔結構中等級地位愈低的單位，情況則恰恰相反，它們獲取和佔用資源的權力弱，但自主支配資源的權力則相對較大，集體產出的效率與個人福利的關係比級別高的單位更加直接。

2、在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下，這一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等級化的產權和身份密切結合的體制。在產權等級愈高的單位中工作的人，其社會身份也愈高，享有產權等級地位較低的單位人員所沒有的社會和福利特權。最大的身份差別就是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但即使在城市內部，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中央國有與地方國有企業之間，也存在重要的身份差別，這種差別直接轉化為不同的福利待遇。

3、政府規模與人口的規模高度相關。各級政府的規模原則上由設在上級政府的編制辦公室來決定。我們的研究發現，一個縣的財政供養人口總規模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無甚關係，而與人口的規模高度相關<sup>④</sup>。在一個高度自治的社會裏，地方政府規模應當既與人口又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而在中國，地方政府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彈性幾乎是零。

4、政策調整經常採取「一刀切」的命令方式，不給地方因地制宜留下多少餘地。這主要是因為，在這種龐大的金字塔式組織形式下，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央政府不願意也不放心賦予地方太大的自主權。中央政府在計劃生育、土地徵用規模、地方政府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等重大問題上都自上而下實行控制。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實際情況很不相同，「一刀切」難免削足適履的情況發生。

5、這個嚴密的金字塔體系有較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貫徹執行中央政府選定的重要目標，不像印度等民主國家容易陷於爭論，許多事難以付諸行動。2004年中國政府能迅速控制SARS的蔓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國政府制度安排有如下特徵：1、處在金字塔結構中等級地位愈高的單位，在獲取公共資源和佔用公共資產上擁有更大的特權。2、在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下，這一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等級化的產權和身份密切結合的體制。3、政府規模與人口的規模高度相關。4、政策調整經常採取「一刀切」的命令方式。5、這個嚴密的金字塔體系有較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 二 改革的策略：不觸動等級特權的前提下擴大市場賦權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森 (Amartya Sen) 曾提出賦權和賦權交易的概念。在他看來，每一種體制在其運行的過程之中，都會形成一種賦權體系 (entitlement system)，其中包含兩種不同的賦權：一是市場賦權，相當於通常說的產權，而另外一種就是社會賦權，比如中國的城市戶口特權<sup>⑤</sup>。所謂社會賦權，用通俗的中國話來說，就是「名份」，這是一種憑藉地位、身份或頭銜，而不是憑藉直接的經濟產出來分享經濟租的權利。「名份」既包括明文規定、受到法律保護的分租權，也包括借助成例和習俗來確立的分租權。市場賦權的交換，一般只要權利主體認可就行，但社會賦權一般通過國家權力才能實現，不能隨意交換。

要改變舊的制度安排，用新的遊戲規則取而代之，變革者必須面對已經形成的社會賦權體系。革命和改良的區分，就在於前者完全不承認過去的名份，而後者為了和平地實現變革，則必須首先承認歷史形成的許多賦權，然後借助有效的策略來轉化或化解那些已經成為變革障礙的賦權。在計劃經濟時期，一切獨立的產權都不存在，個人的經濟自由也喪失殆盡。每個人都被組織到一個統一的單位金字塔結構之中，因而人們缺少生產積極性，效率低下，普遍貧窮。為了增加對個人和地方政府的激勵，中國政府主要做了下列改革：

第一步，是農村的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原來被中央決策者排除在改革的政策選擇之外，但是，在農民和地方政府的推動下，這一激進的變革得以在安徽滁縣地區首先實現。經過三年地方之間的競爭和選擇，包產到戶成為中國農業的基本經營模式。包產到戶的分配原則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這是在維護國家對農民的低價爭購特權的前提下，擴大了農民的市場賦權。農民通過完成公糧指標，獲得了自由生產和銷售的權利。國家之所以要維持對農民低價徵購的特權，就是為了維護城市居民享受低價農產品的特權。

然而，市場賦權的優先擴大，足以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微觀激勵的改善，使國家對農業技術、農業投入品和基礎設施等多年投入以及農民對農田基本建設多年投入一下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農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sup>⑥</sup>。包產到戶雖然沒有改變等級化的產權與身份安排，但是這一變革改變了等級產權的微觀基礎，使集體化的等級產權開始轉變為非集體化的等級產權。在非集體化的等級產權與等級身份制度中，私人財產獲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這樣一來，憑藉個人財富來提升社會地位的大門就打開了，中國的等級身份制度獲得了集體化時代所沒有的社會流動激勵。

第二個關鍵步驟，是地方財政包乾。在不觸動統一金字塔等級產權關係的條件下，地方財政包乾有效地將分租合約關係引進上下級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把地方的財政利益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種合約下，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地方的財政支出與收入掛鉤，但對上級政府的貢獻也更明確。在地方財政包乾的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大加劇，從而促使許多地方政府從反對私有經濟和歧視私人產權，轉變為支持私有經濟和保護私人產權。地方財政包乾促使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而不斷調整和改變本地的制度安排，從而使地方之間的經濟競爭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槓桿<sup>⑦</sup>。

第三個關鍵改革，是實行價格雙軌制。改革前的等級產權制度，在分配生產資料方面存在着系統的歧視。城市部門，尤其是中央和省市直屬的國有企業，享有獲取各種稀缺生產資料的特權，具體表現在它們可以得到各種平價生產資料的指標，而其他級別較低的國有企業則指標很少，集體企業（尤其是農村集體企業）就更少。價格雙軌制允許國有企業將超額生產的產品或未用完的投入品指標賣給體制外的鄉鎮企業。這樣做，既保護了原來的特權，又給予集體、個體企業，尤其是農村的社隊企業通過市場渠道獲取生產資料的機會，從而刺激了供給。換句話說，價格雙軌制為非集體化的等級產權制度，提供了必要的

為了增加對個人和地方政府的激勵，中國政府主要做了下列改革：第一步，是農村的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改變了等級產權的微觀基礎，使集體化的等級產權開始轉變為非集體化的等級產權。第二個關鍵步驟是地方財政包乾。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大加劇，從而促使許多地方政府從反對私有經濟和歧視私人產權，轉變為支持私有經濟和保護私人產權。第三個關鍵改革是實行價格雙軌制。允許國有企業將超額生產的產品或未用完的投入品指標賣給體制外的鄉鎮企業。

價格機制。這一機制，極大地促進了等級產權下的市場化進程，使等級產權制度過渡為同時通過等級特權和市場交換來分配經濟租的一種極為獨特的體制<sup>⑧</sup>。

總而言之，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找到了在既定賦權體系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有效策略。這些改革無疑大大調動了個人和地方政府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發展。但由於各地初始條件、改革時所處的地域及時機不同，分權式的經濟結構與金字塔式的治理結構的矛盾也日漸突出。

### 三 保留等級分租特權的市場化改革後果

#### (1) 欠發達地區：高稅率與財政供養人口的膨脹

財政包乾對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大於內地欠發達地區。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財政包乾對當地經濟產生了非常負面的激勵效果。其中的要害在於西部地區財政供養人口太多。減免農業稅是加劇地區間人均財力不均的又一因素。貧窮地區的行政人員吃不飽，他們更加有可能對現有的企業尋租，從而惡化投資環境。

1980年代初以來實行的分級財政包乾，對於促進市場化改革，促進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是，財政包乾對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大於內地欠發達地區。事實上，我們的研究發現，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財政包乾對當地經濟產生了非常負面的激勵效果。其中的要害在於西部地區財政供養人口太多。

財政包乾雖然激勵各級地方政府增收，但在支出安排方面，財政包乾並沒有觸動國家幹部和職工分租的優先權。財政包乾的規則是，一個縣財政支出的最低水平，首先由該縣財政供養人口的總量來決定。這樣一來，為了保證本地區財政供養人口的收入，欠發達地區政府就面臨着比發達地區大得多的財政壓力，因為它所承擔的財政供養人口的規模，相對其經濟規模而言，往往要大許多倍。其結果，當地政府沒有財力改善投資環境，提供公共服務。儘管一些研究表明，內陸和農村地區在表面上資本邊際收益率很高<sup>⑨</sup>，但事實上內陸地區的資本還是被吸收到原本就有地域優勢的沿海地區，這是導致地區差距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⑩</sup>。隨着沿海地區勞動力和土地價格的提高，資本理應流向要素價格較低的內陸地區，但實際發生的流動非常有限。資本從欠發達地區外流必然使當地就業機會更加不足，迫使農民外出打工。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因此而形成惡性循環：地方愈窮，則財政供養人口負擔愈重，政府愈沒有錢用於公共投資，投資環境愈差，外來投資愈不來，發展機會更加不足。

減免農業稅是加劇地區間人均財力不均的又一因素。農業稅是許多窮地方的重要稅源，中央在取消農業稅以後，政府規模和職能又不變，貧窮地區政府面臨巨大財政壓力。除去工資以外，許多縣鄉的非垂直管理部門幾乎沒甚麼辦公經費。在我們調查的貴州的一些鄉鎮農業技術服務站，月人均活動經費只有五元，何談搞農業技術推廣？這也是為甚麼在西部貧困地區廣泛出現「看病難」、「上學難」的情況。許多地方政府不得不用各種手段舉債求生存。

另外，由於貧窮地區的行政人員吃不飽，他們更加有可能對現有的企業尋租，從而惡化投資環境，迫使資本流向投資環境好的沿海發達地區，進一步拉大已經很大的地區差距。各地財力的不同也意味着地區間和部門間公務員苦樂

不均。按道理講，在同等技能和資歷下，各地區、各部門公務員的工資應無甚區別。不斷拉大的實際工資水平差距會使許多公務員感到極其不公，這也是現在為甚麼要求公務員工資拉平的呼聲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公務員之間工資的不平等儼然成為影響政權穩定的巨大隱患。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如中央提高貧窮地區或低工資部門的工資，又會使當地社會其他低收入階層感到不公，惡化已經很嚴重的社會矛盾。由於公務員吃不飽，即使上級政府增加轉移支付，這些資金也很難落到窮人手中。

近年來，中央政府又下決心在短期內免除中小學學雜費。一些富裕地區，比如蘇州，由於地方政府財力雄厚，已率先提出九年義務教育免費<sup>①</sup>。許多貧窮地區的縣政府財政收入不足以抵消當地財政供養人員工資的發放，在吃「皇糧」人數不變的情況下，免除中小學學雜費無疑對貧窮地區的地方財政是雪上加霜。唯一的辦法是增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可以預期，這樣做的後果是，地方政府的聰明才智將更加用來套取在上面的資源上，喪失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引發所謂的「荷蘭病」現象——外援愈多，地方愈窮。在這些地方，最好的就業機會是市政府工作，人均財力愈短缺，地方精英就愈想往政府或各種公立機構裏鑽。

## (2) 在東部發達地區的後果：低稅率與城市化受限

而在發達的沿海地區，由於迅速的工業化，對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的需求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可是中央採取一刀切的辦法，農業用地轉化為工業用地的指標是統一頒放的。土地供應不足直接影響了經濟增長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面對短缺的土地徵用指標，企業想盡辦法來討好土管部門，腐敗叢生。由於沿海地區工作機會比內地農村多得多，大批農民湧入沿海的城鎮，使實際的城鎮規模遠大於政府的統計數字。浙江等沿海省份，一些鄉鎮外來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因為政府規模是按註冊戶口數目決定的，由於龐大的外來人口的存在，發達地區實際上出現了小政府。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東部的農村地區，因企業太多而收稅人員不足，大都實行包稅制，因而實際稅率非常之低。在低稅率的吸引下，外地人才紛紛前來投資辦廠，不僅為當地農民，也為外來的民工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在競爭和市場擴張的雙重激勵下，東部農村的一些加工業中心自發形成了高效的分工體系，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迹。譬如，在浙江桐鄉縣濮院鎮的轄區內，羊毛衫的加工能力足以影響全國乃至全球市場。儘管稅率很低，但一個鎮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財稅，年收入高達上億元，數倍於西部地區許多縣的財稅收入。但是，依據我國目前非農地租的權利安排，這樣的地方卻不能成長為一個新的城市，因為農民自己或當地居民沒有城鎮建制的權利。

與西部地區恰恰相反，東部地區的一些農村加工業中心，由於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和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政府規模實際很小。在治安、教育、衛生和環保等方面，嚴重缺乏專業化的公務人員。這些地方的就業和收入水平雖然很高，但是許多人依然憂心忡忡，因為他們深知高度專業化的本地經濟非常脆弱。不

公務員之間工資的不平等儼然成為影響政權穩定的巨大隱患。在吃「皇糧」人數不變的情況下，免除中小學學雜費無疑對貧窮地區的地方財政是雪上加霜。土地供應不足直接影響了經濟增長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面對短缺的土地徵用指標，企業想盡辦法來討好土管部門，腐敗叢生。東部地區的就業和收入水平雖然很高，但高度專業化的本地經濟非常脆弱。

少發了財的本地人希望減少風險，增加應變能力，但其需求得不到政府服務的響應，於是只好大量存款，或把子女和財富轉移國外。由於外來民工的工資很低，公共服務又有限，很少有人能定居下來。另外私人企業規模小，前景不穩定，因此也沒有人願意對工人的技能進行投資。這樣一來，土地缺乏、技術工人短缺和政府服務不足多種因素限制了城市化的發展，成為制約沿海發達的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瓶頸。

#### 四 一個擴大社會賦權交換的思路

如何應對歷史形成的分租特權，是對一切改革者智慧的挑戰。今天的改革能否更上一層樓，也將取決於能否像當年發現雙軌制一樣，找到一條巧妙的路徑，來化解令人望而生畏的既得利益，甚至把既得利益者轉化為支持改革的力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遺留下來的僵硬的政府編制和土地徵用指標，很難適應市場經濟下生產力的迅猛變革。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各地對一刀切式的政策執行成本也愈來愈不同。對同一種社會或體制賦權，比如土地徵用指標，各地的需求很不相同。沿海農轉工用地異常短缺，而內地一些地方指標根本用不完。換句話說，土地的影子價格各地差別很大。如果允許交易的話，兩者可以各取所需，取得帕雷托改進 (Pareto improvement)。在這裏，我們提出通過擴大社會賦權交易的辦法來緩解這種矛盾。

指標交換的概念並不新。例如，在京都協議的框架下，歐盟國家建立了二氧化碳等排污指標的交易市場，世界範圍內的交易市場也正在籌劃中<sup>⑫</sup>。排污指標用不完的國家可以出售剩餘指標給其他國家，並將收入用於保護環境。在中國，事實上，指標交換的事情也在發生。譬如，在發達省份內部土地指標置換是很常見的。據新華社報導，江蘇和浙江省通常都採用省內購買土地指標或置換的方式來解決指標不足的制約<sup>⑬</sup>。在江蘇，較發達的蘇南地區每年都要向欠發達的蘇北地區購買用地指標。2002年，杭州市以每畝六萬元的價格向同省的海寧市購買了三千畝土地的使用權。在杭州、寧波、溫州和紹興四市的工業園區，購買土地指標的比例分別為68%、57%、78%和78.3%<sup>⑭</sup>。山東省國土資源廳於2003年也發布了「關於實行建設用地指標置換和農用地整理指標折抵的意見」，鼓勵省內交換土地指標<sup>⑮</sup>。

除了土地指標置換以外，最近又出現了警察異地借調的創新。據《工人日報》2006年4月的一則報導，浙江諸暨市店口鎮外來民工共有四萬多人，其中僅貴州籍民工就有1.4萬人，流動人口的治安成了問題。自2004年起，浙江諸暨市聘請貴州省遵義縣四名警察常駐該市店口鎮，負責管理並服務於在這裏打工的貴州籍農民工。實行這個制度以後，店口鎮治安有了顯著改善。由於諸暨市負擔了這四名警察的薪水，貴州省遵義縣無形中也減輕了財政負擔。實際上，大批民工外出以後，遵義縣警力出現了過剩。這種交換是一種雙贏策略。最近公安部在諸暨市召開工作現場會推廣這一所謂的「諸暨模式」。該鎮又將交換的範

今天的改革能否更上一層樓，也將取決於能否像當年發現雙軌制一樣，找到一條巧妙的路徑，來化解令人望而生畏的既得利益，甚至把既得利益者轉化為支持改革的力量。在這裏，我們提出通過擴大社會賦權交易的辦法來緩解矛盾。除了土地指標置換以外，最近又出現了警察異地借調的創新。這些交換是一種雙贏策略。

圍擴大到計劃生育幹部，也就是通過借調流動人口老家的計生幹部來管理當地棘手的計劃生育問題<sup>⑩</sup>。

這些案例不僅證明了我們關於內地政府規模過大，而沿海政府又規模過小的判斷，而且還說明，各地政府不自覺之間已經在使用社會賦權交換的原理，儘管交換的具體形式不盡相同。上述案例都是基層地方政府之間的雙邊協議，而土地指標的置換基本還局限在省內。

我們提議推廣社會賦權交換的概念，並擴大賦權交換的範圍，創建全國性制度化的社會賦權市場。社會賦權市場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組織沿海地區對非農用地指標進行招標，根據有利於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於增加就業、有利於城市化等原則，分配有限的非農用地徵用指標，並獲得資金建立一個改革與協調發展基金。這個基金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幫助內陸地方政府「瘦身」，具體的方法就是贖買財政供養人員的身份，以價低者優先的原則逐年進行贖買，把內地政府的冗員負擔降下來。據我們調查，這個市場是存在的。在西部地區的鄉鎮一級，人均月活動經費(含工資)平均只有1,000元到1,500元。在這些地方，買斷一個公務員的錢約等於目前工資的十倍。由此算來，只要十二至十八萬元就可以買斷西部的一名公務員指標。保守地估計，一百萬元可以至少幫助減少六個財政負擔人口。而減少這六個財政供養人員增加的地方可支配財力，可以用來減少約一百個赤貧人口(按每個人每年八百元計算)。

發展社會賦權交換的好處十分明顯。首先，被贖買的財政供養人員得到了一筆創業基金，有利於發展當地經濟，緩解貧窮地區資金短缺的問題並創造就業機會。第二，對於既定的地方政府收入，減少財政供養人口等於提高現有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有利於改善公務員的激勵。第三，減少地方政府供養人員的數量，可以騰出更多財力來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投資。第四，可以有效縮小地區差距。一方面欠發達地區有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沿海地區又克服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土地和政府建制瓶頸，可以吸收更多外來人口。

擴大社會賦權交易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社會賦權交易是一種帕雷托改進，有利於協調各地經濟發展，擴大中央政府的稅源。同時，擴大社會賦權交易，需要中央政府充當社會賦權市場的設計者、組織者、仲裁者和執行者。中央政府還可以利用中央的財力，通過定向補貼來改善社會賦權交易市場的均衡，使之更有利於協調發展。中央的財力在社會賦權市場中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自覺地擴大社會賦權交換，對於中國實現現代化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幅員遼闊，地方差異顯著，而政治權力又高度集中，歷史上這些條件都不利於發展全國性的要素市場。歷史上中國藉以克服這種困難的辦法是建立統一的等級結構，通過科舉制度提高精英人才的垂直流動性來維繫中國的政治整合。在中國經濟高速現代化的今天，沿襲舊的傳統反而不利於維繫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整合。近年來地方經濟差距的迅速擴大就是一個重要的警示。它說明，制度化

我們提議推廣社會賦權交換的概念，並擴大賦權交換的範圍，創建全國性制度化的社會賦權市場。組織沿海地區對非農用地指標進行招標，根據有利於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於增加就業、有利於城市化等原則，分配有限的非農用地徵用指標，並獲得資金建立一個改革與協調發展基金，優先把內地政府的冗員負擔降下來。

的等級身份制度，正在成為中國發展統一要素市場的障礙，而沒有要素市場的統一，中國的政治統一也將愈發困難。擴大賦權交換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為中國從等級身份社會向權利平等的現代社會過渡提供了一條平穩的途徑。

### 註釋

① Björn Gustafsson and Li Shi,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9 (2002): 179-204; 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 no. 1 (2005): 87-106; Li Xing, Shenggen Fan, Xiaopeng Luo, and Xiaobo Zhang, "Village Inequality in West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agging Region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no. 31 (2006).

②④⑩ Xiaobo Zha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 no. 4 (2006): 713-26.

③ Xiaopeng Luo,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Logic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odern China Research*, vol. 2 (1995): 1-16.

⑤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⑥ Shenggen Fan,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3 (1991): 266-75; Justin Y.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no. 1 (1992): 34-51.

⑦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no. 5 (1998): 1143-62; Xiaobo Zhang, "Asymmetric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8 (2006).

⑧ Lawrence J. 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55, no. 2 (1997): 285-92.

⑨ Xiaobo Zhang and Kong-Yam Tan, "Incremental Reform and Distortions in China's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⑪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5-09/08/content\\_3460247.htm](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5-09/08/content_3460247.htm)

⑫ 比如歐盟的大氣排放交易系統 <http://ec.europa.eu/comm/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htm>。

⑬ [www.ycwb.com/gb/content/2004-05/03/content\\_685863.htm](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4-05/03/content_685863.htm)

⑭ <http://news.soufun.com/2004-04-05/259802.htm>

⑮ [www.sd-china.com/law/zdu/02.htm](http://www.sd-china.com/law/zdu/02.htm)

⑯ [www.zjrb.cn/news/2006-4/20/content\\_81982.htm](http://www.zjrb.cn/news/2006-4/20/content_81982.htm)

羅小朋 貴州大學扶貧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訪問教授。

張曉波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浙江大學訪問教授。